

Sonntag, den 14. Juli.

Eröffnungs-Sitzung.

Der roth ausgeschlagene Versammlungsraum — La Salle Petrelle — der Saal Petrelle — ist um 9 Uhr gefüllt. Auf der rothen Rückwand der Bühne prangt in Goldbuchstaben nach dem Worte von Marg die Inschrift: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en wir uns!

Rechts und links zeigen sich zwei Namensschilder, hier das der

bedeutendsten vertretenen Städte Frankreichs verzeichnet sind. Ueber beiden

第二国际研究

Auf dem Vordergrund erblickt man die Bezeichnung des Ziels und der Forderungen sämtlicher Arbeiter, soweit sie irgendwo Parteien organisiert sind: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eignung (expropriation) der Kapitalistenklasse, Ver gesellschaftung der Produktionsmittel.

Im Namen der Pariser Organisationscommission — deren gedruckter Bericht vertheilt wurde — entbietet um 10 Uhr der Bürger Paul Lafargue den Abgesandten der Departements und des Auslandes ein herzlich willkommen, ganz besonders den Deutschen, welche trotz der schwierigen Verhältnisse in ihrer Heimath sehr zahlreich erschienen sind, um zu beweisen, daß zwischen dem soc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m socialistischen Frankreich keine Rede ist von jenen thörichten Gehässigkeiten und blinden Leidenschaften, welche die Chauvinisten beider Länder mit so viel Eifer lebendig erhalten. Die aus Europa und Amerika in diesem Saale versammelten Abgesandten vertreten hier keins von ihren verschiedenen Vaterländern; sie schließen sich nicht zusammen unter den Falten der Trikolore oder irgend eines beliebigen anderen nationalen Banners; sie schließen sich zusammen unter den Falten der rothen Fahne, der Fahne des internationalen Proletariats. Sie befinden sich in diesem Saale nicht in dem kapitalistischen Frankreich, nicht in dem Paris der Bourgeoisie — sie befinden sich lediglich in einer der Hauptstädte des internationalen Proletariats, des internationalen Socialismus.

Die Bourgeoisie feiert das Hundertjahr ihrer Revolution, dieser Revolution, welche verkündigte, sie werde Gerechtigkeit,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unter den Menschen aufrichten, und welche mit nichts Besserem zu endigen wußte, als mit der grausamsten und schrankenlosesten Ausbeutung der Arbeiter. Die Bourgeois haben den Adel nur niedergeschlagen, um sich die Beherrschung der Gesellschaft anzueignen, sie haben die feudale Bastille wegrastrifft, nur um im ganzen Lande Arbeits-Bastillen zu errichten, in denen sie die Kinder, Frauen und Männer des Proletariats

0100722

D11
3

第二国际研究

殷叙彝 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国际研究/殷叙彝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

ISBN 7-80109-165-5

I.第…

II.殷…

III.第二国际—研究

IV.D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2875号

第二国际研究

殷叙彝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	599千字
印 张	24.875
版 次	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40.00元

本书由

中央编译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和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资助出版

本书各章执笔人

前 言、第四、五、六、七章	殷叙彝
第一、二、三、十二、十五章	李兴耕
第八、九章	于沪生 殷叙彝
第 十 章	昌竞如 殷叙彝
第十一章	周懋庸 殷叙彝
第十三章	周懋庸
第十四章	王学东
第十六章	李宗禹

作者简介

殷叙彝 1925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李宗禹 1925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李兴耕 1936年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周懋庸 1932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于沪生 1930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学东 1953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副研究员

昌竞如 1955年生,原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前 言

1889年7月成立、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瓦解的第二国际，无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起了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和第一国际解散后的若干年里，坚持不懈地同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了斗争，大致到19世纪90年代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这一基础上，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欧美各国相继成立。这些政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指导下，通过与法国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建立了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的成立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通过第二国际各党内部的争论和斗争，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斗争,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由于这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阶段,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日益滋长,并且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中得到了完整的理论表述。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上都有反映。各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总的说来,第二国际早期几次代表大会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问题、殖民地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是占上风的。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国际策略准则的决议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的缺点,也由于中派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未能进行到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些党的领导已经被机会主义分子掌握,有些党发生了分裂。机会主义的发展终于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和破产。列宁在第二国际时期及其破产后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上述思想为脉络来研究第二国际的理论和策略,分析第二国际从马克思主义逐渐向机会主义演变的过程及其历史教训,把第二国际的问题和复杂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和分析,尽可能根据扎实的材料作出实事求是的论断。

早在1913年,马克思的外孙让·龙格就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书中扼要叙述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在这以后的七八十年内,陆续出版了以德、法、美、俄、意文和其他欧洲文字写作的许多关于第二国际的著作。在一些大部头的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的著作中也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第二国际。关于第二国际

的某一时期、某个侧面、某些问题的专著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70年代末以来我国关于第二国际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我们迄今见到的专门论述第二国际的著作基本上是历史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可以说基本上是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历史。这些著作并不一定都按历次代表大会划分章节,但大多是依次叙述各次大会召开时的背景、大会议程、中心议题的争论情况、决议通过的经过和内容等等,对于与大会有关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和情况虽然也或多或少地提到,但一般不很详细,更谈不到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二种类型一般是以较少的篇幅扼要叙述第二国际本身的历史,而以主要的篇幅叙述这一时期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以欧洲为主,旁及美、澳、亚洲和南非)。苏联科学院1965年出版的两卷本《第二国际史》的体例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它分几个阶段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基本上分国叙述)穿插在叙述第二国际历次大会的各章之间。前一部分的内容相当丰富,而对第二国际大会本身的论述却比较单薄。^①

这两种体裁都有缺点。一本全面论述第二国际的著作,应当抓住第二国际时期的中心问题,把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论述,既要通过各国的斗争同大会争论的关系来看问题的广度、它们的普遍性和在各国表现的特殊性,又要通过各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来看问题的发展。经过这样的

① 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周海乐《第二国际史》已经突破上述框框,采用了新的结构。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三卷本《国际史》第一卷(1961年汉诺威德文版)中关于第二国际的论述超越了代表大会的时间界限,对进化和革命、总罢工、殖民地和战争等四个问题进行了综合论述,在体例上有可取之处,但失之于太简略。

分析和综合,才能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国际性并且说明第二国际从马克思主义向机会主义蜕化的发展过程。像上述第一类著作那样把第二国际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代表大会的历史,就很难看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第二种类型的著作只是代表大会简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或思想史的简单并列,没有能做到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也不容易使人看到问题的全貌。我们认为,当我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第二国际的历史和问题的時候,在论述方式上应当突破上述两种体例的框框,尽量做到把各个时期、各个问题贯通起来,集中地、完整地表现第二国际的成绩、缺点、思想斗争和它最终破产的原因。

根据上述考虑,本书的写法是:主要按专题分章论述第二国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分析问题时一般都比较详细地说明历史背景、问题的提出和发展过程,注意把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同那些与各个问题关系密切、对问题的讨论影响较大的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结合起来,同时还专设一些比较集中地叙述历史背景和过程的章节(如第一、第二、第十四等章)。

我们采用这种写法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主要活动方式是定期举行各国社会党的国际代表大会,在这些会上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组织问题。要了解第二国际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对它的功过作出评价,当然要以这些大会上的讨论为主要根据。但是,如果采取逐次介绍大会的方式,那就很难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系统的分析,而按专题论述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二,这种写法有利于史论结合。第二国际各个时期或各次大会都有一两个中心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先后递嬗,或者是贯串第二国际的始终,但在某个时期处于突出的地位。例如,在酝酿和成立初期主要是争夺领导权问题,接着就是和无政府

主义者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对政治斗争的正确理解。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国际后不久,米勒兰事件和修正主义问题成了争论的中心,结果是就策略的国际准则作出了决定。此后,由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发动局部战争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殖民地问题被列为主要议程,与此同时还讨论了总罢工问题。接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为止。有些问题如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始终是第二国际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贯串在许多争论中,只不过在各个时期、各个问题上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如果分专题来写,就容易说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对问题的实质和有关争论进行系统的分析,也便于说明一些问题之间的联系。由于问题的逻辑发展与第二国际历史的发展基本是平行的,把这些问题的分析综合起来也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历史发展。当然,有些重要的历史发展过程如第二国际的创立是必须单独论述的。总之,这种写法有利于把历史叙述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我们也力求做到这一点,至少要在历史叙述之后从理论角度作出一些论断。

第三,这种写法可以避免把全面研究第二国际的著作写成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史或运动史。第二国际大会上的讨论当然是和各国社会党内的斗争分不开的。各党内部的斗争是第二国际大会上的争论的基础,大会的争论也要对各党的斗争产生影响,因此不能孤立地对各次大会进行研究。但是如果在分析第二国际大会上的斗争时平行叙述各党的历史,就会把书写成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史,而且不易突出重点。我们在以问题为中心论述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把第二国际大会上的争论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每次各有所侧重,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缺点。

以下扼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以及部分章节的特点。

第一章到第五章除了叙述第二国际从酝酿到成立的历史过程和成立大会的情况外,还从几个主要方面说明,由于恩格斯的指导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第二国际从一成立就走上了正确的方向。首先,在第一章“第二国际成立的历史条件”中设“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地位”这一节,说明第二国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和理论基础而成立的。其次,在第一章第三节“欧美国家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和第三章“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党的纲领和章程”中论述了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分析了参加建立第二国际的一些社会党纲领的基本内容和优缺点,并且作了比较,证明这些纲领特别是1891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制定的。第三,过去关于第二国际的绝大部分著作很少对国际的组织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也长期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我们在第四章“第二国际的组织”中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论证了第二国际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是第一国际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指出,第二国际本身虽然没有纲领,但是它的章程第一条所规定的参加大会的条件实际上包含纲领性原则,这是经过国际代表大会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多次争论而逐渐明确的,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第四,我们在第五章“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胜利”中从劳动保护立法问题、策略问题、参加国际的条件等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第二国际初期四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指出这一斗争的最后胜利主要表现在:确定了第二国际各党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机构(特别是通过议会手段和议会外手段相结合)进行斗争,为最后决战作好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这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观点的。把

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可以看出：第二国际前期在思想理论基础、纲领、组织和基本策略方面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重新恢复起来的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①

第六章以大量材料和数字论述了第二国际各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其中包括：领导工人阶级为争取、扩大和巩固普选权而斗争，参加议会选举，在议会中从各方面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我们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议会斗争的理论的发展过程，并据此论证第二国际各党参加议会斗争是工人运动发展壮大的表现，也是符合当时形势的正确策略。我们也援引各党的一些领导人的言论（包括第五章引用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已认识到议会斗争是为工人阶级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进行准备的。有些领导人也明确认识到议会斗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第二国际各党在策略方面达到的新的认识，是各党领导人在恩格斯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时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第二国际在起初十几年处于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阶段，各党在合法斗争中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就，而且还可望不断取得更大成就，因此，党和工会内部开始产生了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这也在党的理论和策略中得到了反映。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和战胜了无政府主义以后主要是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而这一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理论上最完整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即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它与第二国际内部的其他机会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12页。

主义和改良主义派别在思想渊源和理论观点上都有不少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当然也有反映,但它不是表现为理论争论,而主要是围绕由米勒兰入阁事件引起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准则的争论展开的。我们在第七章“第二国际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争论”的第一节里论述了几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流派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关系,在以下几节里论述了米勒兰事件的国际影响以及第二国际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和 1904 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争论。我们力求做到运用国际代表大会记录和有关的第一手材料来说明争论的过程,并且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对两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作出评价,既不因为巴黎代表大会的考茨基决议某些地方比较含糊而否定它,也不仅仅根据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而过高估计它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两次争论暴露了第二国际各党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大缺点:未能明确提出如何从和平时期以合法形式为主的斗争过渡到最后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策略。正因如此,他们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不可能彻底。1905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给予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使他们大大前进了一步。在这一方面,罗莎·卢森堡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章在关于总罢工和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一节中对于这一点作了详细的分析。

第二国际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工会的国际组织。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工会是各国社会党的重要斗争阵地。社会党必须以工人阶级和工会为基础,但工会却不一定都支持社会党,即使支持或倾向社会党的工会在具体问题上也会与社会党发生矛盾。因此,如何处理党与工会的关系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问

题。随着机会主义在工会工作和工会领导人中的滋长，工会和党的矛盾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就是所谓“工会中立论”。第八章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工会中立论”的斗争为中心，分析了第二国际与工会的关系，着重论述了第二国际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工会关系问题的争论以及列宁在俄国反对“工会中立论”的斗争。

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农民问题是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纲领和策略的重要方面。第二国际曾经在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和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讨论过土地问题，但仅仅作出比较空泛的决议，而且此后再也没有讨论土地和农民问题。从几个主要的党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纲领的讨论可以看出两种偏向：或者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的特殊性，为了争取农民对社会党的支持不惜过分地迁就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民各阶层的眼前利益，放弃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或者是在正确指出大生产在农业中也将占优势的同时，过低估计了农业小生产的生命力和工人政党必须向农民作出的让步的长期性，因而对农民的眼前利益重视不够。这两种偏向结果都导致社会党未能把广大农民看成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军。俄国当时面临民主革命，土地问题以及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和农民问题比其他的党更为关心，但只有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土地纲领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理论。第九章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世界战争的威胁日益严重。因此，第二国际从成立时起就很重视关于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等问题的讨论，而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后则把这些问题列为主要议程。历次大会的讨论

是非常热烈的,涉及不少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批判了一些错误观点如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关于用总罢工来阻止战争的主张等等。但总的说来,第二国际及其各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于殖民地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缺乏明确的、一贯的和完整的理论,对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与整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认识得不够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从理论上和策略上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对于机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批判也不能充分获得成果。由于列宁和卢森堡等人的努力,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各国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这一决议既是第二国际各党实际行动的指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革命理论的发展。第十、十一两章详细叙述和分析了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的多次争论。为了使读者能在广阔的背景上更好地理解这些争论的意义,还对几个国家的社会党内关于殖民政策的各种观点以及各党和国际在几条战线上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作了介绍和评价。对于第二国际来说,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平等权利问题只是个别国家的问题,因此未列入大会议程。但列宁通过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及其在俄国的影响的批判,通过对民族自决权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因此,第十章专设一节论述这一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中派主义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中派的特点是摇摆于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力图调和双方的原则分歧并保持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关于中派主义的形成时间,国内外历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看法。我们认为,中派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10—1914年

间正式形成。本书除了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分析了有关的中派主义观点外,还根据上述分期标准,在第十二章围绕几次重大论战集中论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

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6章中所论述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并且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把这些方面的斗争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全面说明第二国际逐步向机会主义发展的过程。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国际及其大多数党的领导已经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掌握,大战爆发时,这些党的领导背叛了历次代表大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和庄严誓言,支持本国政府作战,这时机会主义已发展成社会沙文主义,第二国际破产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①第十三章引用了大量史料,详细叙述了这些党走向8月4日政策的过程,并在这一基础上具体分析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同时也论述了各党左派特别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忠实执行第二国际的各项国际主义决议,不屈不挠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言论和行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本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已停止活动,但各国社会党仍旧按照中立国、协约国和同盟国这样的政治分野保持一定的联系,甚至召开过不同规模的代表会议。在中立国社会党和交战国社会党之间、在两个交战集团国家的各社会党之间以及在各社会党内部,曾经就恢复国际、结束战争和重建战后和平秩序、确认战争罪责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中也贯串着左、中、右三派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大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66页。